



ZHONGGUO
JINDAISHISHIZHENGWU

郭汉民主编

中国近代
史实正误

中国近代史实正误

郭 汉 民 主 编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k25
85

中国近代史实正误

郭汉民 主编

责任编辑：邓代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198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375

字数：400000 印数：1—1450

ISBN 7-217-00652-X

K·24 定价：7.00元

湘人：89—3

33

117053

序 言

林增平

一

研究历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南，以充足的史料为基础，才能了解和探索到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发展规律以及足资借鉴的经验、教益和启示。所以，史料的真伪是不能不考虑的重要问题。如果所据以探索的史料不真实，当然不可能对所要了解的历史事件作出正确的解释。郭沫若曾经指出：“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为有害。”^①可见，对史料进行考证，使之去伪存真，纠谬得实，不能不成为研究历史的重要手段。

相对而言，古代距今年载久远，需考证的史事较多，但近代史的记述，伪贗讹误也不少。梁启超就曾坦率地承认：“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专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

①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页。

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①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比如，《戊戌政变记》里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蒙光绪皇帝召见一事称：“历时至九刻钟之久，向来召见臣僚所未有也。”然而，另据同一日蒙召见的张元济在回忆录里写道：

“二十八日（即1898年6月16日）天还没亮，我们就到西苑门外^②，坐在朝房里等候。当日在朝房的有五人：荣禄，二位放到外省去做知府的人，康有为和我。荣禄架子十足，摆出很尊严的样子。康有为在朝房的和他大谈变法，历时甚久。荣禄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召见时，二位新知府先依次进去。出来后，太监传唤康有为进去。大约一刻钟光景，康先生出来，我第四个进去。……”

1929年，《清史稿》的关外本出版，张氏在上海接到其好友汪兆铭寄来的《清史稿》中的《康有为传》。当他看到叙述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的一段文字，提到康有为是“自辰入至日昃始退”。便在该页上旁批：“并无其事。元济是日同被召见，康先入，不过十余分钟，即退出。”^②

揆诸事理，张元济两度提到康有为被召见不过十余分钟，是可信的。因为，当日在朝房等候传唤的还有张元济和荣禄，如果康有为“面圣”真的“历时至九刻钟之久”，确属“自辰入至日昃始退”。这对于区区七品刑部主事张元济来说，被冷落在朝房里候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91页。

② 参见【新西兰】叶宋曼瑛：《从戊戌期间的张元济看中国的开明知识分子》，载《中国文化》第4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1月版。

旨是不打紧的，但荣禄却是文渊阁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的朝廷重臣；而且肯定有军国大事启奏，能捱到朝房里从清晨坐等到太阳偏西吗？所以，张元济回忆是可靠的。将召见“大约一刻钟光景”，夸张为“历时至九刻钟之久”，就是“将真迹放大”的一例。此外，《戊戌政变记》还存在对光绪皇帝多所溢美和若干时日的差错，已有学者撰文订正。^①

在近代史的资料里，没有如实记载史事经过的资料，数量不少。还有一些资料，则是为了某种目的而编造的伪书或虚假记载。比如：署名沈懋良撰的《江南春梦庵笔记》和署名汪堃撰的《盾鼻随闻录》两本号称记述太平天国史事的资料，就是撰者蓄意蒙骗作伪所捏造的伪书。类似这些作伪杜撰的资料，在中国近代史的其他重大史事记载里都曾发现过。

所以，在发掘、整理和使用近代史资料的过程中，就存在大致可区分的两项工作：一是识别伪书的辨伪；一是考证记载讹误失实的订谬。建国近四十年来，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对辨伪和订谬两项工作都较重视，并取得显著的成绩。

二

一般说来，有些史料的谬误，可能不致过多影响对所涉及的人和事的评价和理解。比如：关于辛亥革命时期杰出女革命家秋瑾的生年，即有1875、1877、1878、1879年4种说法。何者正确？当然应该加以考证。但即使采用了错误的生年，也不会贬损对秋瑾的评价。然而，有些史料以讹传讹，却足以导致人们对所

① 参阅汤志钧：《人物评价和史料鉴别》，《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版第329—334页。

涉及的史事得出错误或不够妥当的看法。比如，关于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死因，长期以来相传为服毒自尽。直至1962年台北世界书局将藏于曾国藩后人家中的“李秀成亲笔供词”予以影印（称《李秀成亲供手迹》）出版后，就使洪秀全的死因和不少有关太平天国的史事得以澄清。《亲供手迹》的同一页上有两处提到，一处称：“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廿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而亡。”又一处称：“天王之病，因食咄露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也。”事情真相，写得一清二楚，所谓“服毒自尽”的说法从何而来的呢？原来出自曾国藩的窜改。他在抄呈清廷和刊刻外传的所谓九如堂刻本《李秀成供》上，将上述两处删去，窜改为“因九帅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经此一改，事件的经过就变成：由于湘军的围困和加紧挖掘地道攻城，洪秀全遂被迫自尽。这样，湘军的“功勋”就烘托得更高了，而洪秀全的死，则可以宣称为“畏罪自杀，幸逃显戮”。洪秀全的评价也就多少受些影响。

值得提出的是，有些史料经过辨误订谬后，还足以纠正或改变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理解和评论，使某些特定的历史研究课题或多或少地获得实质性的突破。以下，举几个近年在这方面的成果为例。

（1）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穿鼻草约”的问题。

沿袭多年的错误说法是：

“……英国人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坚持无论如何要占据香港。义律认为需要使琦善明白他军事上的软弱无力，竟在1841年1月7日命令英军占领了虎门炮台。这时琦善才绝望地认识到，只有虎门要塞才能把英国人与

广州隔开。为了避免他认为可能发生的一场屠杀，他无可奈何地于1841年1月20日同意了穿鼻草约。英国人在这项协议中提出的条件是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两国官员在平等的基础上直接交往，并且开放广州贸易……”^①

这种不实之词，早就有人置疑。1983年2月2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发表胡思庸、郑永福的《穿鼻草约考略》，以很有说服力的论证，断言：其一，琦善始终没有向义律允诺割让香港，只允寄居，而且始终未答应英方占有香港全岛，只同意寄居香港一隅；其二，所谓“穿鼻草约”是在英军强占香港之后，才单方面制定的条文，琦善始终未在该约上签字或加盖关防。故“穿鼻草约”当时既未签订，事后也未经中、英两国政府批准。从而考证，英国侵略者捏造所谓“穿鼻草约”，乃是为了制造强占香港的口实，以掩饰其攫夺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径。

（2）鸦片战后英国强租广州河南和广州人民反河南租地斗争的年份问题。

1980年以前先后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述和有关的年表辞书等，凡提到鸦片战争后广州群众反河南租地斗争，都肯定事件发生于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1979年，廖伟章、林增平分别在《学术研究》第二期、《近代史研究》第二期上撰文考证，事件并非发生于1844年，而是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讹误的原因，是梁廷枏所著《夷氛闻记》的刊印有差错，学术界不察，故长期沿袭致误。从表面看来，年代记载谬误，似乎无关宏旨。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这是英国资本主义无端起衅的侵略行

^① 《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上卷第213—214页。

动，长期误作1844年，则可能界人以口实，讥为无中生有；甚至指控为捏词构陷，致有损于我国学术界的声誉。而且，也难免会导致对前后有联系的其他史事的评述产生差错。故1983年《中国历史学年鉴》发表的一篇《鸦片战争史》研究述评的文章，认为这一史事发生年份的订正，是近年鸦片战争史研究明显进展和创获的成果之一。

(3) 多年来，学术界据以论述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史料，是刊行于清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五月的康有为《戊戌奏稿》。1982年，孔祥吉于《晋阳学刊》该年第二期上发表《〈戊戌奏稿〉的改纂及其原因》一文，用他在国家第一档案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查阅到的清廷档案以及《杰士上书汇录》中所收藏之康氏奏折的原件和进呈书原本及序，发现《戊戌奏稿》中各奏章与原件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有的甚至面目全非，个别奏稿如《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在档案中竟属阙如。从而指出，《戊戌奏稿》是经康氏改纂的，改纂之处比较集中于三点：“（一）加进了制定宪法，立行立宪的内容”；“（二）《奏稿》将维新派在变法时的政治纲领由开制度局改为开国会”；“（三）《奏稿》极力掩盖康有为尊崇君权的思想”。作者认为，经改纂的辛亥年刊行的《戊戌奏稿》所反映的大多是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等辛亥革命前流亡海外时的政治主张。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正同康氏保皇党开展论战。康、梁为了回击革命派的笔伐，以求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并藉以敦促清廷尽速推行宪政，故匆匆将《戊戌奏稿》推出面世。这是改纂戊戌时奏章，聚为一集的政治目的。孔祥吉这一考订和论证，说明使用辛亥年《戊戌奏稿》为依据所进行的关于戊戌维新的研究，无论是对当时康梁等人思想认识水平的估计，对所提出来的维新新政奏章条

陈所能达到的变革程度的预测，都会与实际情况有或多或少的差距，这就显然难于写出情真事确、信而有征的戊戌变法史。

至于史料辨伪工作所获致的成效，也是较明显的。这里，首先要提到在史学界享有盛名的罗尔纲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罗尔纲不仅力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南，孜孜不倦地撰写了大量关于太平天国史的论著；而且不辞辛劳地收集并整理出大量太平天国的资料，并以一丝不苟、精密考证的态度和功力，对资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辨伪订谬工作。他对太平天国起义日期，太平天国的制度政策和颁行的诏旨条令等的考证，大都得到史学界的信服。他对伪造太平天国史事，过去流传颇广的《江南春梦庵笔记》和《盾鼻随闻录》所作的辨伪订谬，确实将这两本谬种流播、以讹传讹的伪书揭露无余，使之再也不能在史学界产生蒙骗作用。

还应当提到，一部由一个英国人伪造的《景善日记》被揭露的辨伪工作，也是值得介绍的，《景善日记》载有义和团运动高涨期间北京朝野的动态，原有学者撰文表示置疑。但因建国初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曾将其收录，故似乎又将疑团冲散。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一般都征引采用。近年，丁名楠发表题为《〈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①一文，论证了宣称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在景善的住宅发现这份日记的英国汉学家白克浩司(B. Backhouse)，纯系撒谎诬骗。《景善日记》实系白克浩司伪造的。嗣又有胡滨、吴乃华将英国休·特雷费—罗珀(Hugh Trevor-Roper)所著《北京的隐士—白克浩司爵士的隐藏生活》(Hermit of Peking—The Hidden Life

^①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第492—504页。

of Sir Edmund Backhouse) 译成中文出版^①，书中揭露白克浩司“在政治上也是一个一贯招摇撞骗、弄虚作假的大骗子”。并从多方面坐实了白克浩司伪造《景善日记》的作伪行径。由于这本伪造《日记》中记载了清廷自西太后至军机大臣荣禄、刚毅等在义和团运动高涨时的言行和廷议的情况，故多为研究者所征引。近年既考证出它纯属伪造的赝品，这就不能不使研究者感到有对义和团运动若干史事重新进行估量的必要。

三

值得提出的是，有些近代史料经考证确属讹误之后，仍然为少数研究者所继续引用，以致重复过去的错误或不当的看法。比如，近两年出版的一部近代中外关系史的著作里，即仍然肯定琦善曾经与义律订立“穿鼻草约”的说法；同时，也依旧因袭广州人民反河南租地斗争发生于1844年的讹误。又如，因曾国藩篡改李秀成“供词”而产生的洪秀全“服毒而亡”的谬说，虽经台北世界书局于1962年将“供词”原本影印出版而予以澄清，但嗣后少量中外近代史著作，却仍然沿用上述谬说，苏联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1972年出版）就是用“服毒自杀”来记述洪秀全的结局的。

再举一例：1987年一份学术刊物上发表《谭嗣同就义前的精神心理分析》一文，对谭嗣同履险蹈危，勇于献身的坚贞气概和牺牲精神，作了很好的分析，颇具新意。但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在描述戊戌政变前谭嗣同等读到光绪皇帝“密诏”后的活动时，

① 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

引用了两件业已经过考证的不确切的史事。原文如下：

“1898年9月14日，光绪皇帝召杨锐入宫，赐康有为等人密诏，云：‘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康有为等人见后，捧诏大哭，六神无主，束手无策。在这紧急时刻，谭嗣同建议，‘密谋招袁世凯入京，用所部新建军，围颐和园，以兵劫太后，遂锢之。’（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二）。康有为顿时大惊，‘执嗣同手，瞪视良久’，说：‘母后固若是，其可劫耶？’……”

据考证，这段叙述中所引的密诏，乃康有为此政变前离京南下，闻听政变发作逃往日本时所伪造^①。光绪于9月15日确给过杨锐一份手诏，但措词不同，其中只提到“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并没有提到康有为，也没有“设法相救”的字样。故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密诏是康有为改纂的^②。但不论称作伪造还是指为改纂，谭嗣同都不可能看到这份所谓光绪赐给康有为的密诏。显然，据此以分析谭嗣同的心理状态，就将是无中生有了。其次，关于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计谋，据考订，不是出自谭嗣同，而是康有为；谭对于采取此一行动还表示：“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③当然，

① 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四、光绪赐康有为密诏考》，《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63—278页。

② 汤志钧：《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③ 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

不论是谭首倡还是康出的主意，都不改变事件的性质和意义，但如就此事分析参与者的心理状态，谁首倡，谁表示异议或勉强附从，就不能不分辨清楚了。

我还读到过一篇发表于1981年的论述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邹容的文章。其中提到，1903年拒俄运动兴起时，留日学生开“拒俄大会”，邹容是发起人之一，并参加了拒俄义勇队。事实上，邹容早在留日学生召开“拒俄大会”（4月29日）之前约两周即回到上海。4月27日，上海绅商和学界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签名册上有邹容的名字。所谓邹容在日本参加拒俄运动的说法，原出于冯自由所撰《革命逸史》第二集的《革命军作者邹容》一文。1980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史》上册第439页已将冯自由的误记作了考证，予以纠正。这可能是文章作者不曾注意到。

上述情况，除了少数研究者偶尔疏忽的原因之外，大约同50年代后期起至70年代“左”的指导思想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在这期间，流行着所谓“以论带史”、“厚今薄古”的口号，就渐次将研究历史简单化、庸俗化，使历史的叙述和研究片面地、实用主义地去类比，去牵强附会地诠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景象。“文革”前，从事史料的辨伪和考订，已被指为“繁琐考证”，“脱离政治”，受到指责和批判。到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大倡“影射史学”，史事纯属胡诌瞎说，史料的辨伪订谬，更是视若敝屣，遭到废弃。目下虽已时过境迁，但遗风余绪，还多少有点贻害。

长期以来，在我国旧史学研究中，不少学者曾经历代师承一种史料即史学的观点，认为研究历史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史料的考证。史学家将史料考证得确凿无误，就实现了研究的目的。这种旧史学传统中的弊端，是我们所不取的。我们也不赞成忽视甚至

摒弃史料的辨伪和订谬。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积极学习和采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日臻完备的史学方法，将对史料的辨伪和订谬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训练和重要环节，从而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加速地向前推进。

基于上述看法，我认为《中国近代史实正误》一书的编撰和出版给史学工作者提供了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是颇有裨益的。谨以此文为序。

目 录

序言.....林增平 (1)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实考辨成果述要

.....郭汉民 迟云飞 (1)

中国近代史实、史料、史籍考辨文选

禁烟运动若干问题辨析.....朱金甫 邝永庆 (79)

《穿鼻草约》考略.....胡思庸 郑永福 (86)

三元里抗英斗争组织者考.....吴 杰 (97)

广州群众“反河南租地”事件年代辨误

.....林增平 (101)

洪秀全早期反清诗是洪仁玕的伪作.....沈茂骏 (108)

洪秀全死因及遗诏考辨.....苏双碧 (121)

胡以晃并非死于天京内讧.....邹身城 (129)

洪宣娇考.....钟文典 (138)

辨石达开“伪造”密诏.....王庆成 (150)

魏源与太平天国关系史实考辨.....黄丽鏞 (153)

《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与稿本的对照

.....宜 秉 禾 子 (162)

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考证·····	徐新吾 (172)
祝大椿创办“源昌机器五金厂”辨伪·····	谢 商 (185)
甲申马尾之役法国宣战史实辨误·····	郑师渠 (193)
日本挑起丰岛海战史实考·····	戚其章 (198)
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阵形考 ·····	戚其章 孙克复 关 捷 (204)
刘步蟾黄海战绩考·····	戚其章 (212)
丁汝昌请援旅顺史料辨伪·····	廖宗麟 (224)
李光久与甲午牛庄之战史实考疑·····	孙克复 (232)
《公车上书》考·····	孔祥吉 (237)
《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	孔祥吉 (245)
戊戌政变时间新证·····	林克光 (263)
光绪密诏考·····	房德邻 (269)
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	杨天石 (287)
谭嗣同狱中绝命书当系伪作·····	连燕堂 (299)
正气会及其《会序》考辨·····	胡珠生 (305)
“自立军败于龙泽厚、文廷式告密”说辨讹 ·····	汪叔子 (312)
义和团运动若干重要史实辨析·····	孔祥吉 (321)
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	丁名楠 (335)
孙中山的祖先并非由紫金迁来·····	李伯新 丘 捷 (343)

史坚如烈士《致妹书》辨伪·····	实 元 (348)
1896—1906年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补正·····	刘望龄 (351)
癸卯元旦留日学生排满演说史实考辨·····	桑 兵 (360)
“军国民教育会”史实考辨·····	金冲及 胡绳武 (369)
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辨·····	唐振常 (373)
关于苏报案的论争·····	周佳荣 (382)
同盟会非“团体联合”史实考·····	郭汉民 (386)
《民报》“封禁”事件考辨·····	唐振常 (400)
《新民丛报》停刊考析·····	张 瑛 (411)
《新民丛报》宣传宗旨辨·····	张 瑛 (417)
《龙华会章程》主属考·····	杨天石 王学庄 (420)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	杨天石 王学庄 (430)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补证·····	曾业英 (446)
辛亥“三·二九”之役陈竞波非侦探辨·····	郭汉民 (451)
戊申钦州上思之役与郭人漳军作战非误会辨 ·····	傅志明 (458)
谋略处考·····	吴剑杰 (465)
汤化龙密电辨讹·····	杨天石 王学庄 (478)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人辨正·····	张亦工 (489)
关于陈天华几件史实的考订和纠误·····	迟云飞 (496)
蔡锷参加过进步党·····	徐博东 (503)
蔡锷出京与袁世凯的智斗及史实订正·····	魏 明 (506)
蒋翊武非时务学堂学生考·····	周秋光 (511)

附录 中国近代史实考辨目录索引 (1949—1987) ·····	(514)
-----------------------------------	---------